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民族史译文集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历史研究室资料组编译

一九七九年

编者前言

本集收编各篇系译自苏联1972年出版的《亚洲博物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一著。译文按原著目录中的次序排列。

亚洲博物馆建于1818年。1930年，它与东方学家委员会、佛教文化研究所和土耳其学研究室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东方学研究所。1950年由列宁格勒迁莫斯科，设列宁格勒分所。《亚洲博物馆——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概述了该机构自1818年至1968年的历史。本集所收各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联的满学、藏学、西夏学、蒙古学和突厥学在一百五十年间的发展历史，对我们了解这方面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是，应该指出，这几门学科都是在沙俄侵略势力逐步向东方扩张时而发展的，是为沙俄的殖民政策服务的。文中对沙俄侵略扩张政策的实质只字不提，对沙俄时期以各种身份、各种名目潜入我国边疆和內地的各式人物，极尽美化之能事，对从我国盗窃去的大量珍贵文献的侵略行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等等。希读者对文中提供的诸如此类的反面材料，予以批判。

11719/12

目 录

- 满学..... М.П. 沃尔科娃 (1)
- 藏学..... М.И. 沃罗比耶娃—杰霞托夫斯卡娅
Л.С. 萨维茨基 (9)
- 西夏学..... Е.И. 克恰诺夫 (41)
- 蒙古学..... И.И. 约里什 (50)
- 突厥学..... А.Н. 科诺诺夫 (81)

满 学

M.П.沃尔科娃

从十八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中期的一个半世纪内，俄国的满学是为实用的目的而存在的。从俄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官方联系的时候起，满学家即在科学院外交委员会亚洲司、伊尔库茨克总督下属机构恰克图海关担任译员。

1716年，俄国传教士团在北京开始其活动。它的工作人员和教徒规定学习汉语和满语。北京传教士团长期成为培养俄国汉学家和满学家的中心。从1844年开始，喀山大学开设满语课，从1851年起在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设此课程^①（为汉满语专业；从1864年起为汉满蒙语专业）。

满族语文学俄国学派有许多学术著作（И.К.罗索兴，А.М.伏拉迪金，А.Л.列昂节夫，А.С.阿加福诺夫，С.В.利波夫佐夫，П.И.卡缅斯基，Ю.克拉波尔特，З.Ф.列昂节夫斯基，Г.М.罗佐夫，В.В.戈尔斯基，В.П.瓦西利耶夫，И.И.札哈罗夫）。他们注意到满文原著的重要性，最早提议把许多最重要的满族文献译为俄文。这些满学家对汉语和满语很有造诣，对满族人民的精神世界了解很深，在汉族和满族文学方面具有渊博的学识，因此他们才能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编写出高质量的满俄字典、满语教科书和满文文选，并译出准确的满族文献俄译本^②。

十八世纪俄国研究满族文化的专家们，向世界学术界介绍了自己第一批主要著作。罗索兴致力于将《八旗通志初集》一书译为俄文准备出版^③。这部多卷本的满族历史著作，由列昂节夫完成，并于

1784年问世；他还出版了中国满清政府的法典^④。除了这些译著外，罗索兴、列昂节夫、伏拉迪金，阿加福诺夫还将一些汉文典籍译为俄文，为研究满语准备了参考书。

十九世纪，С.В.利波夫佐夫继续先辈工作，把《理藩院则例》的满文本^⑤译为俄文。П.И.卡缅斯基和列昂节夫斯基致力于多种语言字典。罗佐夫是欧洲把《清史》^⑥译为俄文的第一个人。他们在译出第一批满文原著俄译本和编写出第一批多种语言词典、供满语研究用的参考书的同时，也深入研究和掌握了这一语言的政治、行政、语言学专门词汇。学者们在那时就为以后的科学研究准备了必需的文献资料。

戈尔斯基根据满文原著写出了两篇关于满族历史的文章^⑦。

在戈尔斯基之后从事于满族文化研究的有В.П.瓦西利耶夫、И.И.扎哈罗夫，А.О.伊万诺夫斯基，А.М.波兹德涅夫院士。其中扎哈罗夫的两种著作——词典^⑧和语法^⑨——至今仍是研究满语不可缺少的参考书。

在北京传教士团供职的我国专家，除本职工作外，还从事满族文献的搜集。大部份收藏品后来都藏入彼得堡图书馆。目前列宁格勒集存的满文写本和刊本乃是全世界最完整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满文文献（国立列宁格勒大学高尔基科学图书馆东方部、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手稿部、国立M.E.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一直是学者们所注意的中心。每一件写本和刊本从收藏之时起，照例要经过图书馆的整理。

这项工作由于有像В.М.阿列克塞耶夫和В.П.科特维奇这样的东方学家参加，在一般清理登录过程中，就对先前无闻的资料作过一番精心的考证。在二十世纪初，亦即在1918年的两个月内，原先担任乌鲁木齐领事，在吉林、齐齐哈尔、伊宁任领事馆秘书的H.H.克罗特科夫^⑩致力于亚洲博物馆满文特藏的登录工作。我们有一些

引人兴趣的手稿，是克罗特科夫藏件中满族原著的代表作。他还留下一份满文资料目录^⑩，存于亚洲博物馆；附有序言，在序言中作者指出了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藏件的科学意义。

科学院通讯院士、彼得堡大学教授B.П.科特维奇最先注意到库藏写本的宝贵财富，试图从中编制满文写本和刊本全部藏件具有科学价值的目录。科特维奇（1872——1944）^⑪有计划地研究列宁格勒集存的满文写本和刊本全部藏件。但是他在这方面发表的科学著作，是着重对亚洲博物馆藏件的研究。这就可以说，他是亚洲博物馆中第一个开始满学研究的学者。

在《满文特藏》^⑫和《满文文学》^⑬两文中，科特维奇介绍了集存的满文文献的珍贵价值，并分析了满文文学的特点。他指出了满文文学同汉文文学的区别，它在世界史中的意义和地位。

科特维奇曾在彼得堡大学东语系教授蒙语和满语，他是俄罗斯考古协会东部分会很活跃的的成员和集体项目的卓越组织者。又是参加建立彼得格勒现代东方语言学院的东方学家之一，曾被选为新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1923年，当科特维奇被提议推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时，C.Ф.奥登堡、B.B.巴托尔德、H.Я.马尔、И.Ю.克拉奇科夫斯基院士高度评价了他的活动：“下列签名者认为；推举B.П.科特维奇为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可以表示对俄国科学在远东研究领域中的卓越代表之一给予了应有的重视”^⑭。

二十年代，科特维奇迁居波兰，1944年在那里去世，学衔为波兰科学院院士。

科特维奇出走之后，П.И.沃罗比耶夫（1892——1937）继续研究满文藏件，他是从1930年起开始在亚洲博物馆工作的。他于1915年毕业于彼得堡大学汉满语专业。沃罗比耶夫担任过重要的行政职务：如国立俄罗斯博物馆馆长（1925——1931），莫斯科国立历

史博物馆馆长（1932——1934），东方学研究所付所长（1934——1937）。此外，沃罗比耶夫还为国立列宁格勒大学和北方民族学院学生讲授满语，同时还积极参加亚洲博物馆—东方学研究所的科研工作。从1930年起，在东方学研究所创立蒙古满洲研究室。根据研究室的活动计划和报告，我们可以概略地了解沃罗比耶夫的科学兴趣^⑩。

沃罗比耶夫曾打算探讨下列问题：汉文历史文献译成满语的方法研究；收集满族文学史资料；将满族史诗《尼山萨满》译成俄文；从雅弗语学理论看满语数词；记述东方学研究所档案室所存写本特藏；在齐齐哈尔档案馆文献基础上研究十七世纪俄中关系史的满文文献；编制东方学研究所写本和刊本满文特藏的新的分类目录和字顺目录。

沃罗比耶夫拟定了发展苏维埃满学的基本方法：1) 刊布满文原始文献；2) 对写本和刊本作科学记述并编制其初步目录；3) 研究中国历史上满清时期文化史。

沃罗比耶夫论述满文起源新资料的论文，是他的一项科学成果^⑪。论文证明作者对满文史料的知识很渊博，它向读者介绍了引人入胜的资料，阐述问题以精确清晰为其特点。

1931年，沃罗比耶夫在亚洲博物馆东方学家委员会会议上宣读了《论满文字母表》^⑫的报告。

1936年，东方学研究所组成了满学家小组，小组从此能够按照研究所计划完成工作。因此在1936年5月，在中国研究室科学工作者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组织满学家分部（Секция）的问题^⑬。满学家分部把像Б. И. 潘克拉托夫、К. М. 切列米索夫、В. А. 热勃罗夫斯基、С. Д. 迪雷科夫、А. В. 格列宾希科夫这样的研究员组织在一起。格列宾希科夫教授担任分部主任。在批准的章程草案中规定了满族小组成员的基本工作方针^⑭。每一个专家都有自己的个人计

划。热勃罗夫斯基（1893—1938）开始两个题目的研究：1）《满文刊本记述》；2）《满洲经济史·征服中国前的大清和满洲（1616—1644）》。

热勃罗夫基于1914年毕业于拉札列夫东方语言学院。毕业后在黑龙江地区担任译员。热勃罗夫斯基在进入东方学研究所工作后，立刻着手编写满文刊本解说目录的准备工作。在一年内，他编成了满文特藏全部刊本解说目录的草稿^②。他的这个目录记述包括作品的汉文、满文名称；有关书籍出版的地点、时间、印数、开本等的说明、及作品内容简介。可惜他未来得及对全部满文作品作出简介和把所有作品的名称都译为俄文。

热勃罗夫斯基在短期内完成了大量的工作，证明了他是一位精通汉、满文文献，学识完备的专家。关于刊本解说目录的著作仍未完成，这是因为热勃罗夫斯基在研究所工作的时间不长，他只工作到1938年初。

研究员切列米索夫和迪雷科夫这时已开始研究满文官方文书，并将他们翻译为俄文。与此同时，在满学领域中，以卓越的专家潘克拉托夫为首的一组学者编写了满洲手册^③。潘克拉托夫还计划写关于满文方形文字的发生和发展历史的文章。

满学家分部主任 A. B. 格列宾希科夫也提出了他很早就注意到的三个题目：编写札哈罗夫俄满字典的补遗本；综合达呼尔（Дахур）人风俗和语言资料以及创立满洲历史地理学。

格列宾希科夫（1880—1941）1907年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东方学院汉满语专业。1911年他在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完成实习。

格列宾希科夫给国立远东大学学生讲授了十八年的满语。他多次到中国，实地考察满洲文化习俗情况。他根据各地旅游印象写了大量文章，他在这段期间内所写的论文以《满文文献书目》^④最负盛

名，本文介绍了满文原著之代表作。

1935年，由于格列宾希科夫转到东方学研究所工作，就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迁居列宁格勒。他在这里写了题为《满洲土著民族的文字》^②的长篇文章，文中附有若干满文写本和刊本的译文。

随后，格列宾希科夫准备出版1747年版《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③原著译本和注释。这项工作之进行是因为这位研究者多年来对满族萨满教有一定的研究兴趣。他在满洲旅行时（1908，1909，1913年）幸运地找到三种《尼山萨满》^④的满文手抄本。据存挡的文书判断，格列宾希科夫曾打算出版原著和原著的俄译本。从档案中保存的材料看，证明他对札哈罗夫满俄辞典作过增补工作^⑤。这些资料包括对满俄辞典提供的现代政治术语的各别札记和借自汉、蒙、吉尔吉斯，鞑靼、梵、朝鲜、西藏语言的满语词汇表。

格列宾希科夫在东方学研究所的科学活动是同研究每一份满族文献以及准备发表满文原著及其俄译本联系着的。

格列宾希科夫于1941年^⑥列宁格勒被包围时去世。

战后，M. П. 沃尔科娃开始研究满学家前辈提出的问题。她准备出版《尼山萨满》原著、转写文和译文^⑦。这部著作是她根据格列宾希科夫在满洲发现的几部抄本而出版的。

沃尔科娃同时出版了潘克拉托夫主编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集存的满文写本总目^⑧。

注 释

- (1) A. П. 科纳科夫：《苏联的满学》，载《苏联科学院院报·语言与文学学部》，卷六，第四期，第417—427页。
- (2) Б. К. 帕什科夫：《俄国学者对满语和文字研究的贡献》，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简报》，卷十八，莫斯科，1956年，第3—18页。
- (3) И. К. 罗索兴：《八旗通志初集》，卷1—17。圣彼得堡，1784年。

- (4) A. Л. 列昂节夫：《大清律例》（或《大清律集解附例》——译者）即满清政府法典三卷，圣彼得堡，1781—1783年。
- (5) С. Б. 利波夫佐夫：《理藩院则例》，圣彼得堡，1828年。
- (6) Г. М. 罗佐夫：《清史》抄本，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家文档室，第一类，目录1，第3号。
- (7) В. В. 戈尔斯基：《满洲皇室的起源和创业》，载“北京俄国教会传教士著作集”第一集，第1—187页；同作者：《论现今统治中国的清朝及满族名称的起源》，同上，第189—244页。
- (8) И. И. 札哈罗夫：《满俄大辞典》，圣彼得堡，1875年。
- (9) И. И. 札哈罗夫：《满语语法》，圣彼得堡，1879年。
- (10) 关于 Н. Н. 克罗特科夫，见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全宗2，目录1（1918），第九号，第38张。《1918—1922年的彼得格勒东方学》，彼得格勒，1923，第86页。
- (11)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家文档室，全宗32，目录1，第10号。
- (12) M. Lewicki, Wladislaw Kotwicz, Szkice z dziejow, polskiej Orientalistyki Warszawa 1957, Cmp: 7—13; Bibliographia Wladislawa Kotwicza, M. Kotwiczowna. —Ro, t. xvi (1950), Krakow, 1953, Cmp: XXXI—XLVIII; Wladislaw Kotwicz, M. Lewicki, —Ro, t. XVI (1950). Krakow, 1953, Cmp. XI—XXIX.
- (13) В. Л. 科特维奇：《满文特藏》，《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手册》，第66—68页。
- (14) 《满文文学》，《东方文献汇编》，第二分册，彼得格勒，1920年，第116—127页。
- (15) С. Ф. 奥登堡，В. В. 巴托尔德，Н. Я. 马尔，И. Ю. 克拉奇科夫斯基：《关于 В. Л. 科特维奇科学著作记述》，载《俄国科学院院报》，第六集，第1—18号，1923年，第371—372页。
- (16) 见《1930—1931年蒙古——满洲，汉——西夏研究室计划和报告》，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全宗152，目录1（1930），第27号，目录1（1931），第29号。
- (17) П. И. 沃罗比耶夫：《满文起源和发展的新资料》，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学报》，卷五，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年，第115—136页。
- (18) П. И. 沃罗比耶夫：《论满文字母表》，《1931年苏联科学院报告》，第216页。
- (19) А. А. 什图金：《1936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室工作概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家文档室，第一类，目录1，第162号，第43—45页。
- (20) 《满学研究分部章程》，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全宗152，目录1，1936年，第3号。
- (21) В. А. 热勃罗夫斯基：《满文刊本记述》，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家文档室，第一类，目录2，第30号。

- (22) 《内蒙古》集刊，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家档案室，第一类，目录1，第164号。
- (23) A.B.格列宾希科夫：《满文文献代表作概略》，符拉迪沃斯托克，1909年。
- (24) 见A.B.格列宾希科夫全宗（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东方学家档案室，全宗75，目录1，第35号）。
- (25) 同上，第69—72号。
- (26) 同上，第41号。
- (27) 同上，第32—34号；并参阅：《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全宗152，目录1（1936），第10号、第37号。
- (28) 关于A.B.格列宾希科夫，见《永志不忘的书》（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东方学家档案）。
- (29) M.П.沃尔科娃：《尼山萨满》，原文，转写和译文，莫斯科，1961年。
- (30) 《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满文写本记述》，莫斯科，1965年。

白 滨 译

藏 学

М. И. 沃罗比耶娃—杰霞托夫斯卡娅

Л. С. 萨维茨基

俄国研究西藏始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即在额尔齐斯河沿岸阿巴赖寺(系和硕特部首领阿巴赖所建——译者)发现藏文写本之后。发现写本一事不仅在俄国学术界、而且在对藏文藏语了解尚少的国外，都引起了浓厚的兴趣。

从十八世纪最初廿五年起，俄国的藏学经历了漫长而又艰巨的道路。在藏学史的各个阶段，掌握的材料范围的广度及其研究所涉及的方面，首先取决于要有足够的有素养的专家，取决于俄国东方学发展的共同进程和藏学家本身的学术专长。俄国藏学史可分为五个时期：(1)从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初开始(最初接触到藏文写本)到1829年；(2)从1829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加紧对中央亚细亚进行综合研究的开始阶段；(3)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1917年；(4)从1917年到1941年；(5)卫国战争结束之后。

十八世纪二十年代——1829年^①。这个时期在俄国藏学史上可称为准备时期。这时对西藏地理及其居民、语言、宗教和文学进行系统研究还只是开始。对所得材料的研究一般来说还只是对它们进行描述而已。那几年，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许多人不仅不是藏学家，甚至连藏语藏文都不懂。在阿巴赖寺发现藏文写本后，俄国学者感到必需使这些写本成为世界科学的财富，有必要在释读上探讨一番。对于能和操藏语者交往的人来说，完成这项任务自然就简单些、容易些。伏尔加河流域的卡尔梅克人和外贝加尔的布里亚特人中间

住着一些藏族喇嘛。他们之中还可遇到精通西藏文献的行家，和他们来往可有助于收集必要的西藏资料。

著名历史学家米勒 (G.F.Müller) 院士于1735年访问色楞格布里亚特人，结识了绰那寺(Чонэ)的藏族学者、布里亚特僧侣界大教主阿旺·彭错(Агван-пунцог)。彭错将阿巴赖寺一部藏文写本的起首部分为米勒译成蒙语，并用蒙文字母转写这部分原文。米勒不懂蒙语，又由外交委员会翻译彼得·斯米尔诺夫(Петр Смирнов)替他翻译阿旺·彭错的蒙语译文，原文则改用俄文字母转写。米勒再将俄文译文译成拉丁文。这篇拉丁译文与藏文原文一起，发表于1747年^②。米勒在这部著作中记述了阿巴赖寺废墟，刊印了该寺的佛象。米勒的著作揭开了俄国藏学的第一页，是俄国释读藏文文献的初次探讨。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帕拉斯(P.S.Pallas)院士曾到过色楞格布里亚特人住地。他向居住其地的藏族喇嘛收集西藏地理、语言和宗教的耐人寻味的资料。在帕拉斯和喇嘛的交往中，叶尔格(И.Ириг，科学院翻译，1795年去世)予以大力协助。他精通蒙语和藏语，为帕拉斯摘译了若干藏文古文献。帕拉斯将所收集的材料和叶尔格的译文纳入其记述居住在俄罗斯帝国辽阔边疆地区的布里亚特人、蒙古人和藏族的两部主要著作^③。其中，帕拉斯发表了叶尔格对十五——十六世纪藏文著名伪经书《嘛呢宝训》(《Мани-кабум》)前八章和第九章起首部分的撰述。帕拉斯走后，叶尔格在恰克图继续独立工作，编写了蒙古语词典和语法，还翻译了若干藏文著述，完成了藏语语法概述。这些著述都没有发表^④。

米勒、帕拉斯和叶尔格在其游历期间收集了第一批藏文蒙文的写本刻本，后移交给科学院。叶尔格编写并发表了当时留存在科学院的藏文、蒙文和梵文的写本刻本的第一个目录^⑤。

米勒、帕拉斯和叶尔格的活动在欧洲学术界中唤起了对藏语藏

文的兴趣，并为过渡到对西藏进行更为活跃的科学研究作了准备。

1829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对藏语和西藏文学的科学研究始于1829年。是年，雅科夫·伊凡诺维奇·施密特（Яков Иванович Шмидт，1779——1847，生于阿姆斯特丹。1829年起为初级研究员，1833年起为正式院士）选进科学院机构。施密特是当时研究蒙藏语最卓越的专家。他在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人中间经商三年，后从事科学工作。施密特向卡尔梅克人住地的藏族喇嘛收集了藏语、西藏文学、历史和宗教的珍贵资料。对施密特来说，在伏尔加一带的活动等于上了一座蒙藏语的好学校。施密特进科学院时，正是各方面成熟的年令，精力充沛，写出了开创俄国藏学这门科学的著作^⑥。

他的早期著作阐述藏文起源问题和藏语、藏文特征（与印度语相比较）问题。施密特所提出的关于藏文来源于北印度婆罗米字（Брахми）变体之一的立论至今不易推翻。施密特最早确立了藏语词典中唯一正确的单词排列原则：不是从词的第一个符号开始，而是从词根的第一个符号开始。这项原则在其著作发表后，已为全世界所接受。他在为编写藏语语法和词典作准备的早期论文中对该原则已有论述^⑦。匈牙利学者绰玛·戴·克勒什（Csoma de Kőrös）所编的第一部科学的（不同于欧洲传教士式的）语法^⑧出版后五年，施密特发表了藏语语法^⑨。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出，他对绰玛·戴·克勒什所编语法是熟悉的。应该指出，施密特从他自己所研究的藏文古文献汲取了编写语法的材料，材料叙述的布局在其早期著作中已有独到的周密考虑和准备。

继语法之后，施密特又出版了藏语词典^⑩。这部词典收编了各种不同的、数量颇多的词汇——这是作者对当时已为人所知的藏文古文献中最重要部分整理的结果。尽管后来出现了叶斯开（H.A. Jäschke）和达斯（S.C. Das）的更完整的词典，施密特词典仍不失

其意义，因为在他的词典中仍可发现其他词典所没有的词汇。

施密特有许多著作是阐述佛教史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研究佛教基本论旨，于1830年发表^①。施密特很重视刊布西藏文学和文字的古文献。他发表了在西藏享有盛誉的《贤愚经》（《Дзэн-лун》）的藏文原文和译文^②。根据他的创议，纳塘版甘珠尔目录付交石印，后存入亚洲博物馆，列为希林格（П.Л.Шиллинг）的藏件^③。

由于施密特的努力，亚洲博物馆藏文写本刻本的藏件大量充实，其中收入了席林格搜集的两大宗（1835和1848年）藏文刻本（三千多份）。施密特和伯特林克（O.Boehtlingk）一起编制了亚洲博物馆藏文写本刻本的目录^④。

施密特的著作开创了俄国的藏学。这些著作是从科学的观点理解沙俄边区民族——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藏语和藏文文献是他们和佛教世界发生联系的有效工具）的文化史和文字遗产的初次探讨。

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从汉文史籍《廿三史》和《通鉴纲目》中摘译的阐述西藏章节的译文，在藏学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⑤。

科学院继施密特而起的是席夫内尔（A.Schiefner, 1817—1879）。

席夫内尔在第一批俄国藏学家中，也许是第一个不是通过和藏族喇嘛交往的途径，而是通过自学方式研究藏语和藏文文献的。席夫内尔同时又有成效地研究了印度学，是这一领域若干学术要著的作者。他的学术兴趣极为广泛。他研究藏语语法，刊布藏文古文献，发表关于西藏历史和文学的学术论著，从事佛教及其史料的研究。席夫内尔不同于施密特，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研究不致力于从整体上论述藏语语法体系，也不致力于编写供学习用的藏语实用教材。他从当时欧洲语言学的观点探讨研究藏语的个别语言事实。席夫内尔的许多论文是阐述藏语语音学和形态学的。他最先论述了藏语元音体系和辅音体系，提出了自己对藏语前加字的起源和功能的假设。其中许

到今天仍然站得住脚，而且在以后的几代藏学家著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席夫内尔对作为语法附加成分的藏语语气词的功用^⑩以及词的形态构造^⑪，也兴致勃勃。

席夫内尔关于佛教的著作曾出版过几部佛教古文献（刊布全文或片断）、佛教词典以及藏族作者关于佛教传布史的选集，他所著的以西藏史料为基础的释迦牟尼传一书，是他研究佛教的早期学术论著之一^⑫。席夫内尔组织出版了藏文典籍中的几部经文^⑬。与瓦西利耶夫（В.П.Васильев）同时，他发表了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藏族作者多罗那他所著《佛教史》的德文译本^⑭。

席夫内尔出版了梵藏蒙佛教词典。这部辞典刊印自席林格运回的木简^⑮。席夫内尔很重视研究藏文佛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对于丹珠尔经，他最注意的是其中关于因明、医学和语法的著述——藏族学者对佛教大藏经所作的贡献^⑯。席夫内尔对甘珠尔经感兴趣的是这部经书中发生于藏地的佛教文学题材及对这些题材的整理诠释工作。他编纂了源起于印度、经西藏加工整理的故事集，准备出版。这部著作在他身后才在伦敦发表^⑰，得到欧洲东方学界的高度评价。席夫内尔有一系列著作研究佛教文献中个别题材是如何发展的^⑱。

因席夫内尔的努力，亚洲博物馆收藏的藏文写本刻本数量大大增加，使该馆在1848年就已经要对施密特和伯特林克的编目予以补充^⑲。

科学院不止一次地承担地理学会组织的外国学者考察队所收集的语言学材料的出版工作。筹备出版的席夫内尔在此项工作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一些极珍贵的材料因能出版而成了科学的财富，并且常导致语言学中新学科的产生。

俄国卓越的藏学家和中国学家瓦西利耶夫院士的活动，和席夫内尔的活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

瓦西利耶夫的功绩在于：他第一次在世界上提出了科学地研究

佛教的问题，进而孕育了谢尔巴茨柯伊（Ф. И. Щербачкой）佛学派在俄国的出现。该学派源起于东方语言系* 和亚洲博物馆，但真正的发展是在1917年后。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1917年。十九世纪最后廿五年，俄国研究西藏的兴趣更浓了，成功地组织了几次去西藏的旅行（O. 诺尔祖诺夫、Г. И. 策比科夫、Б. Б. 巴拉狄因）和研究中央亚细亚和西藏的考察（Г. Н. 波塔宁、Г. И.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А. Г.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В. А. 奥勃鲁切夫、Н. М. 普尔热瓦斯基、М. В. 佩夫佐夫、В. И. 罗鲍罗夫斯基、П. К. 科兹洛夫，等等）。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全世界对中央亚细亚语文学和佛学的精细研究兴盛一时。从当地居民所得的古文献，特别是英、法、德、俄、瑞典和日本去东突厥斯坦考察所写的著作，为研究昔日住在中央亚细亚的各民族文字、语言、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丰富的材料。许多国家的学者——中国学家、印度学家、伊朗学家和突厥学家——投入了新发现的古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东突厥斯坦的这些发现产生了中央亚细亚语文学这一新学科。这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藏学就成了这门科学的一个环节。弗兰克（O. Франке）和陶玛斯（F. Thomas）出版的东突厥斯坦发现的西藏文书，第一次为研究有文字记载（八世纪）的古藏语提供了材料。藏文古文献开始被用来诠释佛经的各种译本，其中不仅有汉语和回鹘语译本，还有公元第一千年时在中央亚细亚地区存在过的于阗—塞语和粟特—伊朗语的译本。

从事中央亚细亚语文学各门学科研究的俄国学者，一时群星灿烂，其中与研究西藏及其文化、历史和语言有关的学者确据显著地位。俄国藏学派的组织者为奥登堡院士（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学术指导为谢尔巴茨柯伊院士。

* 该系设在当时的彼得堡大学。——译注